

## 翻译与文化超越

张 弛

翻译在人类进步和文化更新的进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全球化时代,各国、各文化人群之间的交往更加密切和便捷,翻译的作用非但没有被削弱,反而被强化了。同时,全球化时代的人们,对于翻译的要求也更加苛刻。下面分几点谈谈。

### 翻译:文化交流的工具与文化创新的手段

任何一个文化在其诞生之初,都具有或大或小的爆发力,使其在一定时间内可以自我提升。但是,到了一定阶段,在爆发力消耗殆尽以后,如果没有从外界注入新的活力,该文化就进入了自我复制期,停滞、退化直到最后完全消失。

人类天生有着求知欲和好奇心,因此,各民族就不断地寻求扩展自己的知识,更多地了解外部世界。因此,即使是在史前阶段,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群之间已经有了交通和来往,从而建立了初步意义的文化交流。在最近两千年里,文化交流愈来愈密切和频繁。由于彼此使用着不同的语言,翻译就成为交流的工具。由交流带来的新观念(比如佛教之于中国,中国思想之于欧洲启蒙哲学家)、新思想(比如马克思主义之于五四运动)、新工具(比如西域乐器和西洋乐器),就为文化输入方注入了活力。这些新东西有时候会成为触媒,将该文化内部已有但无法形成规模和层次的因素激发为亮点,比如,西方文学对于白话文在中国文学正统地位的确立,西方民主观念对于传统儒家“民贵君轻”观念的强化和提升。

从哥伦布旨在开辟沟通东西方贸易的航行以后,尤其是在西

方各国经历了工业革命以来,早先存在的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各种交流,渐渐就演变成了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自1990年代以来,这一进程借助于世界贸易组织、卫星通讯和网路,使得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变成了全方位的。与全球化进程相适应的是,在每一个文化中,懂得一门或好几门外语的人数大大增加。但是,由于全球语言种类极多,人们对于翻译的依赖性并未减少。因此,翻译仍然担负着它作为文化交流工具和文化创新手段的功用。而且,随着文化发展速度的加快,翻译速度也加快。十几年前,在一种语言区出版的书籍,常常要在几年、几十年以后,才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出版。但现在,一本书同时以多种语言出版已经是很平常的现象。即使先以某一语言出版,其他语言的译本也常会在极快的时间内出版,比如《飘》之续集、《希拉里自传》、《哈里波特》等等。在全球化时代,对翻译的速度会越来越苛求。

### 翻译与民族自尊心

在各种文化之间定出高下尊卑的做法,虽然已经遭到许多人类学家的反对,但在事实上却一直存在。这种心理必然会影响到对翻译对象的选择,然而这种选择本身基本上理性的。比如古代日本、高丽、越南翻译了许多中国的典籍,但中国从这些国家引进翻译的典籍却少得可怜,因为它们能够供给中国的新东西太少。相反,中国从印度引进翻译了许多佛经,而且某些典籍被一翻再翻,因为印度提供了中国自身发展不足的宗教。玄奘取经归来,唐太宗亲自郊迎并建大慈恩寺为译经院,可见其重视程度。

西方中心论近几十年来一直遭到东方学者和部分西方学者的抨击。我们不需要在西方面前妄自菲薄,但需要理性地接受这个事实: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各国在文化创新上的速度和幅度都超过其他地区。这种情况导致了许多西方人认为他们不很需要了解其他文化区的现状,而其他文化区的人则可能怕落后而紧盯西方文化的发展,亦步亦趋,盲目跟进。在表面上机会均等的全球化时

代,仍然是实际上的不对等交流。这不是一个永恒的现象,不需要太情绪化来看待它。需要看到,即使在同处于优势地位的西方各个语言与文化之间,也有着不对等的机会。荷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使用过的希腊语,今天并不是其他西方国家学生常选和首选的外语。为自己的文化自豪的法国人,也需要无奈地接受法语相对于英语的被冷落。2004年3月19日,在巴黎密特朗国家图书馆组织的《法国文学在东亚和东南亚(中国、韩国、日本、越南)的历险》(L'Aventure des lettres françaises en extrême Asie: Chine, Corée, Japon, Vietnam)的研讨会上,巴黎七大东亚系日裔教授 Cécile Sakai 的报告中给出了几个数字:2003年日本的出版物中,译自英语的有10%,法语的只有0.003%;而美国出版的译自所有其他语言的,加起来只占当年出版物的3%,显示其唯我独尊、对他人的不屑一顾的神气;法国出版的译自中、韩、日、越级中文字的加起来只占2%,而中国比之其他三国,已经因中法文化年而享受了殊荣(共有176种译自中文的书出版,是往常年份的两倍)。

在文化交流中,我们需要放弃狭隘的民族自尊心和无用的面子观念,应该像鲁迅先生在《拿来主义》中所主张的那样,大胆地去学习他人的长处和优点,充实自己、提高自己。到一定阶段以后,如果我们具有了极大的创新能力,我们会再次令其他文化中人刮目相看,也会有数量巨大的中文书籍被译成多种外文。我们自己现在每年出版的书籍中,虽然译自外文的所占的比例和日本不相同,但译自英语的比例最高应该是毫无疑问的,这和使用英语的几个大国在文化创新中的领先地位相适应。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日本和中国,现在每年出版的译自黑非洲地区和东欧各小国语言的书籍都寥寥无几。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这与这些地区能够提供的文化新事物太少有关。

### 翻译的恰切性问题

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人类历史,就是一个多语言的历史。有很

多语言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通过代代口传的方式,保存着使用者的集体记忆,确认着他们文化身份。德拉克罗瓦说过:“思想造就语言,也被语言所造就。”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使用这一语言的人群(小到数十人的部落、村庄,大到数亿人的语言区,如汉语区、英语区、阿拉伯语区)的观察和思维方式。笛卡尔认为全人类都有的理性是建立彼此交流的根本基础。钱锺书先生也指出:“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这是翻译能够成为沟通不同文化的手段的原因。

但是,具体到翻译本身,则有一个恰切性的问题。恰切的翻译是一个基本不可能实现的理想,因为每一种文化都有它专属的词汇和语法,属于一种传统的语言,不可能产生出能与属于另一种语言传统的独创见解精确对应的词汇。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很贴合原文。所以,当我们说一个翻译是恰切的时候,也只是说对于不谙熟原作语言的人来说,它相对地达到了可接受为原作之替代品的程度。

恰切程度的高低,和译者对于原作的语言和该语言文化的熟悉程度有关,也和译者对于他的翻译工作语言(常常是母语)的掌握水平有关。赵元任先生在五四时代翻译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并不是字字准确,但与后来的多个译本相比,它却是最为恰切的,因为它传达了原作的神韵。郭沫若翻译的《浮士德》可能不是字字精确,但却比后来的精确译本更传神,因而更恰切。

翻译者有时候因为自身的外语水平很受限制,或者根本就没有忠实原作的愿望,把翻译的过程当作自己的创作机会,翻译出来的作品就很难说恰切了。林译小说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风靡一时。林纾以不失雅致的白话加上他个人的想象和润色,使得西洋小说符合了风气初开时的中国读者的期待视野而得以广泛流行。但是,随着中国人对西方文化与西方文学了解的增加,林纾的翻译就让人觉得不够准确,更谈不上恰切了。钱锺书先生举例说,十七世纪法国德·马罗勒神父翻译的古罗马诗人《马夏尔的讽刺小诗集》被时人称为《讽刺马夏尔的小诗集》。掌握了法语以后的

昆德拉,指责他的成名作《玩笑》的最早法译本很不忠实于他的原作,他也毫不留情地批评卡夫卡作品的法译者歪曲原意。

在一切的翻译中,对于与另一种文化独有的观念相联系的词汇的翻译最难,也最不容易做到恰切。比如,至今在汉语中都没有一个能够恰切传达西方哲学的核心术语“on”(希腊词的拉丁形式,与其对应的英文为“be”,法文为“être”,德文为“sein”)。1987年,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两本重要著作,海德格尔的 *Sein und Zeit* 和萨特的 *L'Être et le Néant*,终于有了完整汉译本。这是当代中国文化史的大事。遗憾的是,硕学的译者们不约而同地将“Sein”和“Être”译成了“存在”。在同一年,昆德拉的作品开始陆续和中国读者见面,造就了许多“昆德拉迷”。遗憾的是,他的哲学意味极深的 *L'Insoutenable légèreté de l'être*,被译成了意思平庸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être”一词指向终极的意思被完全屏蔽掉了。而根据这部小说拍成的电影,竟然被香港的不知名译者弄成了轻佻感伤的《沉重浮生》!类似的误译是,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的有名问题“To be or not to be?”,卞之琳先生译为“活还是不活?”存在主义的研究权威 Walter Kaufmann 在其 *From Shakespeare to Existentialism: An Original Study* 里,将莎士比亚看作存在主义的一个源头。如果令哈姆雷特苦恼至极的仅仅是现实和具体层面的要不要活下去的问题,那么他根本就不可能和萨特的洛根丁(《厌恶》)和加缪的莫尔索(《局外人》)遥相呼应,他的问题就不可能持续触动历代的读者和观众。用“在”或“存在”来翻译西方哲学的“être/sein/be”,将附着于这些词的深意遗漏了。笛卡尔的名言“Je pense donc je suis.”,英文通译为“I think, therefore I am.”意思丝毫没有损伤。汉语翻成“我思故我在。”笛卡尔思想的革命性却被这个普通的“在”字屏蔽掉了。伯克莱的的名言“To be is to be perceived”,法文译为“Être est être perçu”,二者的意义完全同一。但在“存在就是被感知”这个通行的汉译中,核心词语“be”被置换掉了。许多中国人弄不懂为什么在20世纪的西方,存在成了一个大问题。实际上,是成了问题,才导致了“existence”发生了根本基

础的动摇。

## 解决对应词语缺乏的可能方法

佛教初入中国时,外来的经师和中国的僧人向道家 and 儒家借用了不少词汇,以便于中国人理解。但在随后的几百年中,中国的僧人为汉语创造了许多新词和一些新字,来避免一般人对于佛教教义和道教及儒教的混淆。自19世纪以来,汉语增加了许多新词甚至新字(化学元素的汉字一半以上为新造字),就连“存在”、“意识”之类词语,也是在近代才被赋予了做哲学名词的功能。

文化交流中对现有词汇的意思的增加(使其承担新的意义)和创造新字词,是文化发展在语言方面的一个自然现象。这也是解决翻译中对应词缺乏问题的正常途径。比如,作为西方哲学核心术语的“be/être/sein”及其他词汇如“idea/idée/Idee”等,对于中国人来说翻译之难度,一点都不下于西方人翻译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特殊词汇时的难度。作为中国哲学和宗教,尤其是道家和道教的核心术语,“道”与西方的“是”(on/être/sein/be)和“逻格斯”(Logos)在意思上有相通之处,但却不能完全对等。几百年来,西方翻译家们都是将这个汉字按照发音转写为拉丁化的“Tao”,这样,在非中国文化的地区,既保全了“道”的意思,也为西方文化增加了一个重要词汇,扩大了文化视野。另一个例子是“阴”和“阳”。把这两个字翻成英语和法语远比翻译“道”字要容易,但现有的含义普通的英法文词(female, feminity/femelle, féminin, féminité; male, masculine, masculinity/masculin, masculinité),不能将作为一种中国哲学概念和思维方式的“阴”、“阳”的深意完整呈现给西方人。于是,这两个汉字的拼音(“yin”和“yang”)就被直接引入到学者的著作,进入日常使用并被收入辞典。近年来,随着许多介绍中国“风水”观念和实践的法文书籍的出版,“feng-shui”也迅速地被大众接受并被收入辞典。由于是日本人将禅学推介到西方,日文“禅”字的拉丁化形式“zen”进入了西方人的专

著、辞典和日常语言。但是,当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由研究禅而进入到禅学的历史中去以后,“zen”大有被“chan”取代之势。比如很权威的法语百科全书 *Encyclopédie Universalis* 2002 年修订完成的第八版中,词条《禅》即使用了汉语拼音“chan”。

汉语在面对来自其他文化的陌生事物和观念时,在勉强借用现有字词的同时,也常常采用译音的办法。有些渐渐成了通行汉语的词汇,比如“浪漫”、“幽默”。有些渐渐地恰切的翻译取代,如 19 世纪末用“巴力门”来翻译英文的“parlement”,直到最后找到“议院”一词(也许受了日译影响?),五四时的拗口的“意底沃罗基”最终被“意识形态”取代。而现在汉语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势,即直接采用新词的原文形式,比如“VCD”、“e-mail”,虽然很快找到了它们的汉语对应词“影碟机”、“电子邮件”。因此,在碰到无法恰切翻译的词语时,宁可保留其全文形式,或者造一生僻词,而不要使用既有的词汇强行翻出来,造成意思的被屏蔽。